

疆吏与军机如何互动？

——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

韩 策

内容提要 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私信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频繁影响政治运作。1937年黄濬披露的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就引人注目。但该主人非如黄濬所论是军机大臣杜翰，而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他既是一位被遗忘的中枢要员，也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主角。胡林翼不仅借助京城联络自上而下地获取高层机密，而且将自身意图自下而上地沟通传达，寻求最高层支持。比如钱宝青既提供许多情报，又大力支持湘军四路入皖、主攻安庆之策，还在樊燮案中暗中保护左宗棠；其他盟友则配合肃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都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之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同光时期，随着轮船电报的应用，疆吏与军机互动更为便捷，本应保密的军机处越来越成为泄密之源。这是探讨晚清军机处、央地关系和京城内外信息沟通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 军机处 湘军 胡林翼 曾国藩 钱宝青

作者 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太平天国运动及伴随而来的湘系势力之崛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影响至为深远。湘系之所以崛起，原因复杂，比如八旗、绿营的衰落，道咸之际湖南的地域背景，湘军自身的特色，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领袖的努力经营，以及曾国藩经常讲的“运气”。这些前人研究较多。^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最高层支持。这在乾纲独断的专制时代尤为重要，所谓“上之授权不专，则下必到处荆棘”。^②况且，湘军作为非经制的军政势力，本为异类，遭受嫉妒和打击实属必然；有时战功越卓著，反而越受猜忌。因此，了解皇帝、军机大臣这些最高决策者的心思，争取其理解和支持，获得一定程度的放权，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湘系内部沟通的情况，由于留存资料和既有研究较为丰富，相对清楚一些。然而，清廷的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董丛林《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湘军的定义和范围，可参考吴志鏗《非正式关系与湘军内部的维系：兼论湘军兵为将有的适用性》，《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4期，1986年6月。

^②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3页。

运筹帷幄以及湘系领袖和军机高层的互动情形,还显得扑朔迷离。一般而言,满人军机大臣文庆和权臣肃顺推服曾国藩和胡林翼,支持湘军;汉人军机大臣祁寯藻和彭蕴章反而压制曾国藩和湘军。^①最近,肃顺推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关键作用已获证实。^②因此,文庆、肃顺更倾向支持曾、胡,应无问题。但肃顺的意愿有多强,力量有多大,能否做咸丰皇帝及王公大臣的主,还有一些疑问。因为站在咸丰和一些大臣的角度看,镇压太平天国当然是头等大事,然而一旦给曾国藩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毕竟,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的历史萦绕心头,让人不得不忧虑。

所以,从咸丰中后期开始,肃顺“当权”似乎已有数年,但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后,曾国藩才获得督抚大权。^③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危急情况下,给曾国藩以总督大权,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及高层疏通。^④这不仅因为咸丰和军机大臣猜忌,也因为不少高官认为,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八旗南征不可。僧王亦“早有此意”,已令山东、河南“预筹饷糈百万”。只是英法联军对京津的威胁突然增大,僧王无法南下。^⑤

耐人寻味的是,江南大营甫一崩溃,胡林翼就向彭玉麟等湘系要角透露,最近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重用曾国藩。^⑥这十余人基本都是经过他疏通联络的力量。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众所周知,胡林翼在湘系崛起中作用甚大。这不仅体现在他坐镇湖北筹饷练兵,协调湘系内部,与湖广总督满人官文交好^⑦,而且也在于他和军机高层的暗中互动。^⑧从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入手,既可对咸同朝局变迁和派系政治有更多了解,也可揭示湘系崛起过程中的一些以前被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他和军机高层是如何互动的?其意义何在?

进言之,尽管在制度上悬为厉禁,但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几乎是普遍现象;越是地位重要的疆吏,越会设法联络军机,否则不但做事不便,甚至位置不稳。^⑨因为军机处围绕皇帝,既掌握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力,又通过奏折、廷寄等文书制度垄断了机密信息。这种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疆吏和外官既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也渴求尽快得知

①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253、516页;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第199页;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龙盛运《湘军史稿》,第170—171、238—242页;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25—31、35—38页。

② 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6页。

③ 1859年夏,石达开势将入蜀,在胡林翼的鼓动下,受咸丰信任的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曾国藩带兵入蜀,出任四川总督。按说肃顺此时也已当权,但咸丰却只允曾国藩带兵而不准总督。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第170—173页。

④ 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6页。

⑤ 《文煜致秋墅(姚仰云)》(1860年6月14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34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⑥ 《致郭崑焘》(1860年6月5日)、《致彭玉麟》(1860年6月6日)、《致李续宜》(1860年6月13日),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15、517、519页。

⑦ 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董丛林:《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贾熟村《对胡林翼及其集团的初步探索》,《太平天国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368页。与官文调整关系,详参王国平《论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及其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龙盛运《湘军集团与满洲贵族关系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⑧ 王尔敏曾指出“林翼凡事须与京官通声气者,正为朝中舆论作安排,此乃向来外官所不可少之运用,在清代实为频繁。”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这方面实有深入论述的必要和空间。

⑨ 当时与曾、胡有竞争关系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就和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及军机章京王拯、吴兆麟、焦祐瀛等人暗通消息。浙江巡抚王有龄也与王拯互通消息。参见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1、23、27、30、48、50—51、54、57、62、66、67、69、72、79、83页。

这些信息。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本有保密功能的军机处愈益成为泄密之源,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问题,虽然有时性质不尽相同。为何法律上严禁而现实中却普遍发生?为何本为保密却经常泄密?这是本文拟阐释的问题。

一、胡林翼与军机大臣杜翰暗中结交?

20世纪30年代,著名掌故学者、《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濬,获见一批胡林翼家藏信札。内中数札,隐语满篇,详论政局,很像肃顺或他这一派的军机大臣写给胡林翼的密信,令黄濬兴奋不已。^①尤其是写于1858年3月26日的一札,不具实名,但云“泐于剑影双虹室”,最引人入胜。黄濬对作者评价极高。他说“统观全书,颇有指挥若定之概”;论当日高官“皆极中窾要”;“筹画兵略,亦有见地,正是当时中朝为曾(国藩)、胡(林翼)奥援之一大人物”。黄濬初疑剑影双虹室主人即是肃顺,后详加考索,断为军机大臣、山东人杜翰。^②

在当年工具书甚少的情况下,黄濬短期内即解读出密札中的人和事,且十之七八正确,实在令人惊叹。他提出在肃顺之外,探寻曾国藩、胡林翼的朝中奥援,用以观察支持湘军成就中兴大业的暗中线索,也颇具启发性。^③美中不足的是,黄濬认定此札来自“肃党”,且出自军机大臣之手,故对作者的研判稍显武断。后来,三种版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将此节冠以杜翰之名,显然认同黄濬的论断。^④

不过,1989年出版的《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有所不同。这部书信集恰好收入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的密札四通。整理者谨慎地注明“发信人姓名待考”。这几乎是该书唯一保留斋号而没有考出作者的情况。四通密札写于1857年,不仅与黄札都是谈论军国大事的长信,而且隐语也颇一致,可知以上密札均出一人。尤为可喜的是,后出数札透露了作者线索。

其中一札有云“弟后进疏材,勉供撰写,时艰适值,报称毫无,但蕲免于食粟之讥,何敢侈谈军国!”^⑤因为军机处负责起草谕旨,所以“勉供撰写”常常是军机处人员的谦语,故此人必是军机处官员。另一札则提示了作者籍贯:“敝乡之防,宁(国)胜于徽(州),徽胜于衢(州)。宁国之入浙者,路险而地瘠”,与徽州一路均可放心,“惟信州、三衢,直达会垣(杭州)”,最为单薄可虑。^⑥此处“敝乡之防”,显指浙江西面防守,可知作者系浙江人。

查1857年军机大臣无浙江人,而军机章京至多有三人:钱宝青(浙江嘉善人,1840年道光庚子恩科举人,1841年道光辛丑科进士)、吴兆麟(浙江钱塘人,1832年道光壬午科举人)、章倬标(浙江金华人,1843年道光癸卯科举人,1847年道光丁未科进士)。^⑦此外,密札显示作者和胡林翼麾下的道员郑兰(谱香)是同年熟人。^⑧郑兰是道光庚子恩科浙江举人,与钱宝青同榜。^⑨故基本可以推断剑影双虹室主人乃是钱宝青。再经对照笔迹,可以确定无疑。

①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2页。

②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6—879页。

③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80页。

④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华书局2013年版均如此。

⑤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杜春和、耿来金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73页。

⑥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8年1月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4页。

⑦ 梁章钜、朱智著,何英芳点校《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229页。

⑧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12月12日,1858年1月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2、375—376、378页。

⑨ 黄安绶编《国朝两浙科名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第379—382页。

进言之,上述密札显示钱宝青和胡林翼暗中互动频繁而深入,那么《胡林翼集》中难道就没有蛛丝马迹吗?胡林翼生前写了大量书信,但1858年以前的信件和写给京官的密函毁失严重。^①所以,与上述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相对应的胡林翼去信,至今尚未见到。尽管如此,《胡林翼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还是留下了线索,因为它收有1859年致钱宝青的长信4通。而且,其内容均是深论军国大事,显非其他虚与委蛇和轻描淡写者可比。如此看来,要了解胡林翼的京城联络网,钱宝青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角色。那么,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胡林翼和钱宝青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其意义何在?这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钱宝青其人其事

钱宝青(1820—1860),字初纯,号萍砣,浙江嘉善人,1841年进士。1851年以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咸丰五年(1855)授大理寺少卿,翌年升宗人府府丞,均由特旨留在军机处,为领班章京。1859年擢左副都御史。^②用咸丰时代杜文澜的话说,钱宝青是“吾乡先达中名誉最隆”之人。^③因此,有必要先认识这位中枢要员。

首先,京城里除了军机处,就属户部和刑部较忙。从户部侍郎王庆云的日记看,至迟到1853年,钱宝青就是户部最受倚重的草奏者。^④金安清也说,户部有要事,钱氏“无不预”。^⑤可见钱宝青才华突出,备受重用。

其次,与咸丰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焦祐瀛略作对比,也可看出钱宝青的分量。焦祐瀛名气大,地位高。其实他和钱宝青均于1851年入值,焦比钱还早数月。然而,1854年钱宝青就以五品京堂候补,留军机处行走,而焦祐瀛得到同样待遇却要到三年之后。^⑥此后数年,地位关键的汉领班军机章京就是这两位。^⑦1859年6月,钱宝青升任左副都御史,因已跻身部院堂官,照例不再担任军机章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被疏远。相反,当年7月,咸丰就派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以湖北乡试主考官为名,实际考察两湖军情,“回京面奏”。^⑧不久,樊燮案突然发酵,牵连左宗棠和湖南当局,轰动一时。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历时数月结案。可见,咸丰有意培养这位年轻人。当然,咸丰或许并不知道钱宝青和胡林翼频繁密信往来。不幸的是,1860年5月,钱宝青从湖北回京后就溘然离世。^⑨不久,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咸丰出狩热河,焦祐瀛以太常寺卿出任军机大臣。可以想见,若非钱宝青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军机大臣的有力人选。

再次,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对钱宝青评价极高。胡林翼不仅与钱宝青深谈时局,对他推崇备至,而且也向官文称赞钱氏“眼力过人”。^⑩曾国藩赞叹钱宝青的密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⑪后来

① 从收录书信最多的《胡林翼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就不难看出,《胡林翼集》的版本,参见陶海洋《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99—212页。

② 《钱宝青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藏,清国史馆传稿,编号:701001348,第1—22页。

③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6,清钞本,无页码。

④ 王庆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荆花馆日记》上,1853年4月24日、27日、6月29日,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6、505页。

⑤ 金安清著,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页。文中误作钱萍砣。

⑥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第103、106、227页。

⑦ 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日记》第8册,1859年2月4日,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80页。

⑧ 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剿平粤匪方略》卷226,第23册,1859年11月23日条,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29页。

⑨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4册,1860年5月16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13页。

⑩ 《致官文函》(1859年9月19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28页。

⑪ 《复胡林翼》(1859年10月16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50页。

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也称钱宝青“冰雪聪明”。^①此外,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之子郭则沅熟悉清代掌故,他在引述钱宝青表彰李续宾和保护左宗棠的事迹后说“其时虽极机隍,而枢近中犹有杰才,斯所以成中兴之治。”^②

不过,在既往晚清史叙述中,就连一些军机大臣也名声不彰,像钱宝青这种军机章京更是多被遗忘。这大抵缘于高层政治向来隐晦,军机处行事慎密,故反映高层活动的“过程性”信息留存甚少;即使留存下来,由于其中充满暗语暗号,也不易解读。当然,军机处的这种信息本就不想让人看到,更不想留给后人研究他们不愿示人的秘密。钱宝青的情况正是如此。此外,钱宝青被遗忘,也因为他在1860年就英年早逝了。但只要对其亲属稍作介绍,就能把他拉进宏阔的近代历史场景。钱宝青胞弟钱宝廉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吏部侍郎。钱宝廉之子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内阁总理钱能训。

最后,尽管钱宝青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一个主角,但很显然,胡林翼绝不止单线联系,他的京城联络网要大很多。下面试图拼接胡林翼京城联络网的大致轮廓。

三、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联络的展开

胡林翼开展京城联络既有必要性,其家世、经历和才情也有便利条件。胡林翼之父胡达源为探花出身,官至詹事,在京城名望颇高。胡林翼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更是万人敬仰。早在鸦片战争前,胡林翼就在京城替陶澍做情报和联络工作。^③所以,胡林翼不仅人脉广泛,而且他对联络京师要人早就在行;迨湖北巡抚任上重操旧业,自然轻车熟路。

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是在1856年冬。^④这至少有两大背景:第一,经过近两年艰苦作战,清军终于攻克武昌,胡林翼随即实授湖北巡抚。此前功劳和地位尚未显现,即使努力联络,也未必受重视,所谓“师久无功,心迹不能自见,即欲自陈,惴惴然恐其不情”。^⑤而今既有了联络资本,也有了迫切需要。因为他马上面临几大问题:一是湖北善后,二是军饷筹措,三是武汉是否设为重镇以及和湖广总督官文如何相处,四是要不要率湘军迅速乘胜东下。^⑥胡林翼必须尽快掌握最高层的想法和决策。

第二个重要背景是,1856年12月12日,亦即清军收复武昌一周前,领班军机大臣文庆不幸辞世。^⑦文庆和胡林翼此前搭班主持江南乡试,因违规而受处分,可谓难兄难弟。近两年,文庆在中枢庇护胡林翼,胡氏“奏上辄邀允,益得行其志”。^⑧同时,文庆的重要幕僚李汝钧(子恒)也正是胡林翼的得意门生。^⑨故胡林翼攻克武昌后,或已得知文庆去世。这意味着他突然失去了最高层的一层重要保护。

① 梁济之父梁承光早年和钱宝青、孙毓汶、潘祖荫等在京交好。梁济著、黄曙辉编校《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4页。

② 郭则沅《南屋述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3—154页。

③ 《呈岳父陶澍》(1835年至1838年),《胡林翼集》第2册,第1023—1029页。

④ 道光二十六年,胡林翼捐纳知府分发贵州后,也与军机章京王发桂、梁瀚、孔庆镛有私信往来,但对时局影响甚微。参见《胡林翼所存书札》《王发桂所存书札》,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⑤ 《致吴振棫》(1856年初冬),《胡林翼集》第2册,第137页。

⑥ 《致郑敦谨》(1856年12月22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138—140页。

⑦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3册,1856年12月13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77页。

⑧ 郭则沅《十朝诗乘》,张彭寅主编,林建福等校点《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页。

⑨ 夏颖整理《景其澹致朱学勤》(1863年3月23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而言之,这涉及道咸之际派系斗争和路线选择问题。1850年,新即位的咸丰罢黜穆彰阿和耆英,重用祁寯藻、赛尚阿、彭蕴章,听信潘世恩和杜受田举荐,起用林则徐和周天爵。但这些用人均令人失望。所以,1855年文庆再度入值军机处,因他是彭蕴章、叶名琛的座师,资历老,能力强,故一入枢就是领班。据说他也是穆彰阿一党。^①显然未必可以这么清楚划分,但文庆入枢确实有些回归旧政、进行纠偏的意思。他支持胡林翼、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确实也使清朝情况有所好转。故宋晋称文庆此次出山,“补救维持不少”。^②就在文庆去世前,彭蕴章的同年好友、浙江巡抚何桂清因感受不到最高层的有力支持,遂称病奏请开缺,竟然获得允准。这大抵是咸丰和文庆的意思。然而,文庆去世不久,何桂清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就受到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支持,简放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耐人寻味的是,何桂清的“重病”转瞬即愈,迅速折回江苏接任。此后几年,何桂清和曾、胡之间多有竞争和不满。^③

以上两层背景,正好解释了为何在1856年冬,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寻求最高层支持。当年12月22日,亦即攻克武昌三天后,胡林翼就给同乡京官郑敦谨写了长信,着重谈及军饷筹措、湖北善后、是否率军东下和武汉地位问题。在密函最后,胡林翼请求郑敦谨与严正基、宋晋等好友“密思”,代为寻求军机大臣支持。^④在郑敦谨、严正基之外,郭嵩焘和吴桐林也是胡林翼重点联络的同乡京官。此外,胡林翼联络的另一角色,就是他的进士同年、南书房翰林沈兆霖。^⑤

除同乡京官、同年近臣外,胡林翼更将目光聚焦于军机处。因为这里毕竟最为关键,可获得既快又准的高层情报。于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进入胡林翼的视线之内。尽管湖北、安徽的军情和胡林翼的动向,早已是钱宝青关注的重点^⑥,但胡林翼和钱宝青此前似未直接交往。此次之所以能搭上线,可能一则因有沈兆霖等人介绍,再则钱宝青才华横溢,性情豪放^⑦,想做一番大事,与胡林翼颇为相近,故能一拍即合。

在此背景下,就有了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的行动。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第一通写于1857年7月17日。函称“自台旌观察黔南,德威遐布,政声所被,久在仰止之中。顷闻秉节江皋,督师鄂渚,每见军书入告,伟略深谋,出颇、牧于词臣,失萧、曹于指顾,为楚中士民额手者,不自坚城光复始也。前读□□后各条,剀切指陈吏治军情,列眉指掌。窃叹方今节钺之中,无此杰识。乃荷瑶章下逮,奖借不遗,捧诵之余,徒增惭汗。”^⑧尽管钱宝青对胡林翼恭维备至,但“乃荷瑶章下逮”,显系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更重要的是,钱宝青立即表示愿意和胡林翼互通有无。^⑨此后,两人密信频通,有时一月不止一封。因路途较远,且这些密札只能通过最信任的折弁或家人寄送,颇为不易,故每函都写得很长。目前能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五通,胡林翼致钱宝青六通。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从中已可略窥当时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的情形。

胡林翼在军机处不只联络钱宝青,他也联系王拯,但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这些情报往来完全

①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第199页。

② 《宋晋致瑛瑛》(1856年稿),《瑛瑛藏名人尺牍》,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当然,清朝的局势好转,也因为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内讧。

③ 董蔡时《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④ 《致郑敦谨》(1856年12月22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138—140页。

⑤ 《沈兆霖来函》(1857年6月14日)、《复沈兆霖》(1861年5月16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237、422—423页。《沈兆霖致胡林翼》(1861年6月17日),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02—404页。

⑥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下,1857年3月3日,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56页。

⑦ 郭则沅《十朝诗乘》,《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581页。

⑧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0—371页。

⑨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3页。

不能与钱宝青的相比。而从何桂清密札可知,王拯(少鹤、遁初)、吴兆麟(筠轩、铁华)是何氏的联络对象。^① 1859年钱宝青退出军机处后,蒋超伯(叔起)成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重要线人。^② 曹毓瑛(琢如)在1860年以后也和胡林翼有所联络。^③ 此外,前领班军机章京梁瀚与胡林翼为进士同年,也是他的重要联络人。^④

胡林翼有没有直接联络军机大臣或载垣、端华、肃顺呢?或许。1858年罗惇衍就曾致信肃顺,控告两广总督。^⑤ 不过,外官私下交通王公和军机大臣颇犯禁令。咸丰即位当年就申明成训,“严禁朝臣与诸王往来交接”,并要求“封疆大吏断不准私行干谒(诸王),信札往还”。^⑥ 因此,除非关系十分特别,否则不敢轻易尝试。1859年胡林翼想从僧王处获得骑兵,也是通过都兴阿写信,自称“疆吏在外,不敢启呈”。^⑦ 后来阎敬铭一入军机处,就在家书中说“自入政府,更不与外官通信”,“军机例不通外信”。^⑧ 尽管如此,王庆云外放疆吏后,与军机大臣文庆、彭蕴章却书信频通。咸丰也有所耳闻,在召见王庆云时还意味深长地问过。^⑨ 何桂清和彭蕴章密信联络,更是确凿无疑。^⑩ 看来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只是这种联络因为顶风作案,都要行事机密,所以信内充满暗语,署名也是千奇百怪的斋号。“剑影双虹室主人”正是如此。

四、“自上而下”的情报获取

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具有多重意义。就“自上而下”言之,可以了解咸丰皇帝及军机大臣的意向,获得机密情报。由于最高层垄断着权力,也试图垄断信息,故窥探高层意思,就是古今常见现象。然而,上意难测,既说明不易知晓,也表示变化莫测。胡林翼与军机要员暗中互动,正可窥测上意。比如收复武昌后,是否令胡林翼率师东下?是否派长江战区统帅?曾国藩能否以督抚身份带军?都是胡林翼最关心的大事。此外,由于各省和军机处都通过密折、廷寄等文书保持密切沟通,高层在各地也有多种信息来源,故借助京城联络亦能辗转获知各省动态。譬如何桂清、叶名琛、黄宗汉、福济、英桂等疆吏重臣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近况以及最高层对他们的态度,也是胡林翼关注的要点。果然,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不仅通报各省最新状况,更透露咸丰和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意向。

首先,是否乘胜率师东征,胡林翼极为关注。因其既关军情,又涉筹饷。1856年12月23日,胡林翼向湘军大将李续宾和李续宜坦白了其中矛盾:“弟所急欲商者是东下之策。是弟东下则恐

① 《何桂清等书札》,第18、21、23、27、30、42、48、49—51页。后来何桂清面临死刑,王拯和彭蕴章之子彭祖贤均上奏施救,“最为出力”。《钱涌清致吴煦函》(1862年7月23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② 《复蒋叔起》(1860年7月13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541—542页。

③ 《复曹琢如王少和蒋叔起》(1860年3月13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458—459页。《曾国藩全集》第17册,1860年6月13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4页。《复曹琢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七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251页。

④ 《补拙斋主人(梁瀚)致胡林翼》(1857年11月1日),《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410—413页;黄澹《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32—834页。

⑤ 《郭嵩焘全集·日记》第8册,1858年8月28日,第116页。

⑥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1851年1月13日,清光绪刻本,第19页。

⑦ 《复都兴阿》(1859年3月28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253页。《胡林翼致郭嵩焘》(1859年4月2日),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2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50—1051页。

⑧ 《阎敬铭致阎迺竹》(1884年5月12日、6月12日),冯雷、王洪军整理《阎敬铭友朋书札》下,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600、602页。

⑨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下,1857年7月31日、10月7日,第888、903页。

⑩ 《何桂清等书札》,第51、57、62、71页。

饷少,更恐劫饷耳。然必须东下,乃是一气呵成之局。”^①直到次年3月,胡林翼仍感慨道“不知皇上仍教进剿否,恐终必东征耳。”^②从钱宝青致王庆云密信可知,这时“中枢之议”确实欲令胡林翼乘胜东下。^③不过,胡林翼以善后为由仍留湖北,派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率水陆大军进攻九江。

不久,胡林翼是否东下与曾国藩夺情复出以及统帅问题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湘军的指挥权和独立性。1857年11月12日,胡林翼奏请起用曾国藩,以统一事权,主要目的是为曾氏谋江西巡抚位置。^④然而,此时太平天国内讫之后元气大伤,清朝军事顺利,九江、镇江甚至天京都有攻克希望,故咸丰及彭蕴章并不认为曾国藩不可或缺。^⑤11月19日,上谕不准所请,反令胡林翼即行东下。胡林翼只好奏陈湖北尚有要事,待九江克复再行率师东征。奉旨克复九江后再议。^⑥起用曾国藩未果,钱宝青随即提醒胡林翼,湘军千万不能落入安徽巡抚福济之手,希望胡林翼亲率东征之旅。^⑦到1858年3月,钱宝青向胡林翼透露“我公东下之说,已化烟云,尽力为之,必有大造于楚。”^⑧胡林翼率师东下之议终于暂时打消。

其次,湘军东下作战必与两江地区发生直接关系,而当时清朝重心在江南大营和江北营,故掌握安徽、江西、江苏及江南、江北营的战况,了解诸省督抚将帅动向,尤其是探知咸丰、彭蕴章对他们的态度,就相当重要。

关于安徽巡抚福济,钱宝青在1857年12月说“从前向帅(向荣)在时,闻皖饷不足,解银五万两,皖帅(福济)即言‘可见向营饷项有余,请将浙江月饷改归庐州。’(胡林翼批:太无良,直非人类)……山、陕月解饷银并不为少,则言‘皖之与楚肥瘠悬殊,解楚三万,解皖二万,可谓倒置。’(胡林翼批:直是狗屁)。”^⑨1858年3月,钱宝青透露福济和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河南巡抚英桂关系微妙,而咸丰对三人均甚信任。他说“天上(咸丰)之于鹤人(李孟群),竟几几以江(忠源)、罗(泽南)视之。”又说“淝帅(福济——引者)不去,皖无睡醒之日;香帅(英桂)不易,豫无睡着之日。此两人者得天独厚(受天子信任),为之奈何?”^⑩随后胡林翼也说“大抵天若救安徽,必须革福帅与李鹤人,乃是转机。”^⑪1858年7月,福济终因屡误事而革职,英桂也调任山西巡抚,李孟群在次年遇害。此外,满人将军福兴驻扎江西广信、浙江衢州一线,防守入浙门户。钱宝青说“福星(福兴)之怯而猾……不特弟等窃议,即内而商贤(彭蕴章)、外而平仲(浙江巡抚晏端书)亦早料之。商贤为此等人既不争权,又不争饷,可听其行尸走肉于衢、信之间;平仲则以天眷稍差,不敢置喙……今若言福星恐误浙事,则曰浙尚无事,没有事,安知其必误耶?圣人(咸丰)誉必有试,毁亦必试,则所失滋多……此事非弟所宜言,然既承详示,故敢约略陈之。”^⑫此可见咸丰和彭蕴章的选人用人和处事风格。

① 《致李续宾李续宜》(1856年12月23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140—141页。

② 《致夫人陶静娟》(1857年3月),《胡林翼集》第2册,第1014页。

③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下,1857年3月3日,第856页。

④ 《胡林翼致严正基》(1857年10月13日),吴彬森《清末手札八则初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6期,第36页。《胡林翼致曾国藩》(1857年11月12日),陶湘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46),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751—752页。

⑤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51页。

⑥ 《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疏》(1857年11月12日)、《奏陈鄂省尚有应办紧要事件请俟九江克复再行率师下剿疏》(1857年11月29日),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9、331—333页。

⑦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12月12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8页。整理者疑此函写于1859年,小误。

⑧ 《杜翰(实为钱宝青——引者)致胡林翼密札》(1858年3月26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7页。

⑨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12月12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7—378页。

⑩ 《杜翰致胡林翼密札》(1858年3月26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7页。黄濬指淝帅为翁同书,有误。

⑪ 《致李续宜》(1858年5月16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167页。

⑫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8年1月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4页。

当时清军主力在江南、江北大营,江苏也是财赋重地,故更受关注。1857年,严正基就曾提醒胡林翼:江督何桂清“近谄大计,非复吴下阿蒙;吴、楚上下交合,于军务大有裨益,宜通书以示联络”。^①钱宝青也多谈江南情形,1857年11月5日的密信称“江南润州(镇江)虽云合围,其江面一边,终成一面之网。根翁(何桂清)来函总云指日可下,似亦仰慰之意。”^②随后来函突出何桂清和江北大营德兴阿矛盾激化“德(兴阿)之与何(桂清)龃龉已深。德劾何躁急,但报闻而未发;何劾德执拗,则令南岸之派员前往帮办。”^③1858年3月来函则批评朝廷信任和春的江南大营,恐难成事。叶名琛获罪后,空出一协办大学士的位置,钱宝青称“江南水部(何桂清)、闽省琅琊(王懿德),以鄙意观之,皆有气而无性者也。来示所谓与役处者,水部为尤甚,然纶扉(大学士)一席,竟有翕然之思[原注:在圣心(咸丰)转不甚属]。”^④这也透露咸丰对何桂清并不那么信任。

最后,京城涉及湖北之事,钱宝青更会随时密告。比如,官文和胡林翼的微妙关系很受关注,钱宝青致胡林翼第一函即提及此事。^⑤因俄国人侵占松花江江滨地区,清廷欲撤回在湖北作战的马队,钱宝青提醒胡林翼可以大胆奏留。^⑥当胡林翼下属郑兰、庄受祺被御史贺寿慈参劾,钱宝青即密告参劾原委。^⑦湖北漕粮折色、保举人才等事在京城反应,钱宝青也会及时相告。^⑧此外,京城大钱难行,物价飞涨,筹饷艰难,直隶、广东、陕西、山西、四川、云贵的新动向,也都在钱宝青密札中有所通报。^⑨

综上,尽管目前只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五通,但已有理由相信,从1857到1859年(1857—1859),钱宝青为胡林翼提供了关于咸丰皇帝、军机处以及各省的详细情报。

五、“自下而上”的意图实现

如果说自上而下地获取情报是一回事,利用情报并借助京师盟友影响决策则是另一回事。胡林翼“自下而上”的联络沟通,确实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实现了自身意图。这在“四路入皖方略”“樊燮案”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问题上体现尤为明显。

(一) 钱宝青密奏支持“四路入皖方略”

众所周知,曾国藩、胡林翼设计的四路入皖方略,不仅最终攻克安庆,而且围点打援,消灭了陈玉成皖北主力,奠定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所以,从后往前看,诚如朱东安所论“曾、胡联手图皖,是该集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后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皆肇基于此。”^⑩但在当时,该方略颇多反对之声。因此,1859年11月,深受皇帝信任而在前线考察军情的钱宝青密奏支持这一方略,就显得弥足珍贵。

① 《严正基来函》(1857年12月26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45页。

②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11月5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6页。

③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12月12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8页。

④ 《杜翰致胡林翼密札》(1858年3月26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7-878页。

⑤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3页。

⑥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7月17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2-373页。

⑦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1857年12月12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78页。

⑧ 《杜翰致胡林翼密札》(1858年3月26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6-877页。《致钱宝青》(1859年2月),《胡林翼集》第2册,第226-227页。

⑨ 详见上引各通《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关于广东及叶名琛的情形,详参《杜翰(实为钱宝青——引者)致胡林翼密札》(1858年3月26日),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77-878页。

⑩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154页。

原来,1859年夏,因石达开有入蜀可能,胡林翼鼓动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惜未成功。9月,官文和胡林翼又邀请曾国藩联手图皖,鉴于上年李续宾孤军深入遭受惨败的教训,计划四路进兵。南线两路“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线两路“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①其中南线两路主攻,由曾国藩、多隆阿、鲍超各部担任,更为关键。然而,就在这时,署理漕运总督袁甲三奏请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至北路,与胜保并力南攻,以防太平军和捻军北上。安徽巡抚翁同书意欲曾国藩北上协同作战。这些意见均发给曾、胡酌办。^②甚至前湖北布政使罗遵殿、湖北按察使严树森皆欲曾国藩“率师北援河南”。^③左宗棠和李续宜则希望曾国藩优先入蜀。^④

尤为重要的是,咸丰为防太平军和捻军北攻,不支持该方略仍要求派出一军、绕至淮北作战。朱批一则谓“诚恐缓不济急”,再则称“惟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语带讥讽,令曾国藩颇感灰心。^⑤他对胡林翼说“十七日所发会奏各折,圣意不以为然,浙饷片亦未蒙允准。从此不敢作奏,概由督帅(官文)主稿。”^⑥胡林翼对钱宝青无奈地说:曾国藩因“中朝不准饷”不准调萧启江和张运兰,故只好奏称兵力仅可守而不可战。^⑦非但曾国藩,此时胡林翼也不受信任。他在8月密保罗遵殿接任湖北巡抚,并多方游说,却未成功^⑧,主要因官文密奏反对。^⑨在此背景下,钱宝青或明或暗的支持非常关键。

10月29日,胡林翼陪同钱宝青来到曾国藩巴河大营,考察两日。^⑩钱宝青随后拜发密奏,于11月22日到京。^⑪他首先指出进兵安徽的紧要性,接着点明四路进兵的必要性“缘楚、皖交界路径多歧,逆匪处处可以抄袭,故必重兵齐发,则贼所上窜之路,皆我所进兵之路,而后可无内顾之忧”。^⑫然后,钱宝青着重为楚军请饷。他说“楚北军饷每月约需银三十余万两,现复奏留曾国藩一军,又须增饷五六万两。……督臣、署抚臣咸以为虑,不能不仰求皇上严飭江西、山、陕、四川等省按期筹解者也。”^⑬不久前,胡林翼致函钱宝青称“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既已月谋三十万之饷。若得秦、晋、蜀三省忠心效力,专济涤帅(曾国藩),月各三万两,则一年之内,皖、江南北,必有成效。”^⑭钱宝青密奏所言,正是对胡林翼的回应。

在战略战术上,钱宝青不仅支持曾、胡,而且反驳翁同书和袁甲三。翁同书称楚军由英山、霍山取舒城,由六安规庐州,为上策。钱宝青则称,庐州“为皖贼渊藪,然其势未可遽图”。袁甲三主张

① 《曾国藩奏复会商剿皖大略并回驻巴河缘由折》(1859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569页。

② 《袁甲三等奏请飭曾国藩绕赴北路会剿皖股折》(1859年10月11日)、《翁同书奏陈皖北糜烂现陈补救三策片》(1859年10月20日)、《寄谕官文等着将张运兰调回鄂省并筹派一军赴防北路》(1859年10月16日)、《寄谕官文等着参酌翁同书所陈三策咨曾国藩谋定后动》(1859年11月1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第576—577、594—595、600—601、619—620页。

③ 《曾国藩全集》第16册,1859年11月6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76页。

④ 《致曾国藩》(1859年9月22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32页。

⑤ 《咨官文、胡林翼》(1859年12月9日),《曾国藩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3页。

⑥ 《复胡林翼》(1859年12月9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95页。

⑦ 《致钱萍缸》(1859年12月23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83页。

⑧ 《致钱萍缸》(1859年8月28日)、《致庄受祺》(1859年8月29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21、322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第162页。

⑩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6册,1859年10月29日至31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75页。

⑪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1册,第498页。

⑫ 《剿平粤匪方略》卷226,第23册,1859年11月23日条,第30—32页。

⑬ 《钱宝青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清国史馆传稿,编号701001348,第15—17页。此段《剿平粤匪方略》未载。

⑭ 《致钱萍缸》(1859年8月28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20页。

曾国藩分兵绕至淮北作战,钱宝青则谓“此次楚军分路进攻,其出北路者,应以六安为止。”四路进兵方略的核心在主攻安庆,围点打援。钱宝青完全赞同。他奏称“近庐州而不攻,则贼无必死之心。搏安庆以全力,则贼有必援之势。我军沿江声势既联,使其来援,则庐州贼分,不来援则安庆势孤,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且逼而不攻,则贼不暇为北窜之谋,即江浦、六合援贼亦必致力于安庆。是不啻诱坚守之贼而使之野战也。一旦出其不意,六安、桐城之兵皆可袭庐州而取之。”^①其实,钱宝青密奏之策,即源于胡林翼。随着战争经验积累,尤其是三河大败后,胡林翼的战略战术明显改变,既强调多路配合,又反对到处攻城,希望留有活兵,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他称“良将劲兵以破援贼为上,顾大局取远势为上;逼城而垒,节短局促,不能尽其所长为下。若援贼破灭,则坚城自下。”所以,当时在胡林翼幕府了解内情的汪士铎就说“钱宝青所奏即本此也。”^②最后,钱宝青密奏紧随曾、胡奏折而发,时机也很巧妙。咸丰称赞钱宝青“不为未见”,令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妥办。

可见,曾、胡四路进兵方略虽好,但一开始颇多反对,故钱宝青的密奏支持非常重要。曾、胡此时之所以不受信任,一大背景就是咸丰九年冬,江南大营接近成功,故咸丰和高层有意裁抑湘系势力。这时震惊朝野的樊燮案,就是一个明确信号。饶有意味的是,钱宝青又一次帮了湘军。

(二) 钱宝青在樊燮案中保护左宗棠及湘系势力

1859年,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朝野注目的樊燮案。他为左宗棠大力剖白,保护了湘系势力。此案颇关湘军前途,孟森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深刻论述。^③它的政治意味可分三层解读:下层是湖南官绅与左宗棠的矛盾,中层是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较量,高层是江南大营军事顺利情况下,朝廷对湘系的裁抑。下文综合新旧资料,进一步澄清案情,突出胡林翼和钱宝青的作用。^④

先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主政,能干而强势,数年来与官文嫌隙已深。1858年冬,官文以永州镇总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以栗襄署理永州总兵。但骆秉章旋即参劾樊、栗二人。樊燮于次年押解长沙受审,官文颜面大失。这时,湖南官绅颇不满左宗棠,向官文中伤左氏;旋又唆使樊燮遣派家人,向湖广总督呈诉骆秉章及黄文琛、贺炳翎等湖南官员,意在牵连左宗棠。官文上奏后,奉旨与钱宝青查办。9月6日,湖广总督行文湖南巡抚,提拿涉案文武赴鄂质讯。^⑤结果,湖南督粮道、署按察使谢煌立即以左宗棠“居首应募”,布政使文格“改置第三”,骆秉章“赫然一怒”,“始更置诸弁兵之后”。^⑥自孟森以来,都认为是文格唆使樊燮,看来至少还包括谢煌。

消息传到湖北后,胡林翼一边恳求官文免提左宗棠,一边依靠钱宝青维持局面。官文起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态,胡林翼遂以私情恳切相求。^⑦同时,钱宝青透过密信向胡林翼通报情况。1859年10月13日,曾国藩已预计钱宝青必然“极力担承”。^⑧在看过钱宝青的密信后,曾氏不禁感喟道“钱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末世人情,一朝失势,险态百出。”^⑨后来,梅英杰称由于胡林翼“力

① 《钱宝青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清国史馆传稿,编号:701001348,第19—21页。此段《剿平粤匪方略》有删节。

② 汪士铎著,皮明麻、田原标点《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75页。

③ 孟森《记左文襄被樊燮诬控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6—641页。

④ 案情可参看贾熟村《对樊燮控告左宗棠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王天奖《左宗棠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107页;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36—78页。既往研究更强调郭嵩焘、潘祖荫、高心夔、王闿运及肃顺的作用,案件经纬还可进一步明晰。

⑤ 《官文奏为已革永州镇总兵樊燮呈诉首府饬换亲供文武串通挟嫌陷害据实奏闻事》(1859年7月26日)、《骆秉章奏报申办革员畏罪狡供之情形折》(1859年9月2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宫中档奏折,406010824、406011072—2。

⑥ 《复胡润之》(1859年10月9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345页。

⑦ 梅英杰著、李润英标点《胡林翼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85页。

⑧ 《复胡林翼》(1859年10月13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250页。

⑨ 《复胡林翼》(1859年10月16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250页。

解之”左宗棠免于提逮武昌。^①显然,其中也有钱宝青的作用。^②

然而,这时咸丰对湘系“朋党”的疑虑颇深。1859年9月,他在召见罗遵殿时,就怀疑左宗棠“招摇撞骗”,又询问举荐左宗棠给骆秉章的究竟是何人,意在胡林翼和曾国藩。^③所以,骆秉章上奏辩解,竟遭朱批严厉诘责“无论事之虚实,该抚总应静候查办。晓谕不休,预占地步,殊非大员度量。朕素知该抚人甚平和,或不出此,而尚如此糊涂者,非受属员怂恿,即为劣幕要挟。此折密封寄与官文、钱宝青阅看,一并查办,不准稍涉偏徇。”^④直斥左宗棠为“劣幕”,批评骆秉章“如此糊涂”,令人难堪。至此,樊燮案扩大化了。正案之外,骆秉章受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的指控更大。曾国藩不禁感慨“从此两湖益成水火”,他与胡林翼均难调处。^⑤

咸丰态度既如此,早就对骆秉章和左宗棠不满的官文,更不打算放过机会。这时,钱宝青尽力保护了左宗棠。钱宝青说,官文起先“缄示”文格,讽喻左宗棠急流勇退;但随后又以左宗棠“性情刚愎具之折中”,他“力言之,乃始抹去”。^⑥从官文和钱宝青的复奏看,钱氏所言确有蛛丝马迹可寻。1860年1月17日奏称“伏查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访。如查其形迹与此次折件稍有干涉,即当遵旨会同严办;如查系平日劣款与此折无干,即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参奏。”^⑦显然,左宗棠的事情仍将调查,而湖南问题也做了定性,就是属员、幕友积弊甚深。次日,官文对湖广高官的年终密考两单一片均照例留中,但另有两折,封面朱批“内二件俱留中”不知是否与骆秉章、左宗棠有关。^⑧1860年2月23日,官文和钱宝青称“连日明查暗访,仍无端倪”,因正案已结,钱宝青例应起程北上,左宗棠的问题仍由官文“另行专折奏复”。^⑨

2月底回京之际,钱宝青当向胡林翼通报了官文仍不肯罢休。曾国藩得知后称“樊案果不出尊料,近日京案皆出一辙矣。”^⑩京案指郭嵩焘被僧王参劾,都针对湘人。在此背景下,胡林翼决定立即阻止左宗棠赴京。3月7日,他致毛鸿宾的急信云:左宗棠“未审已否经过襄阳?有密函要件,乞尊处速专妥干跑夫,沿途探递,期于必呈为禱”。^⑪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屡被引用的二信,一则称三月三日抵襄阳后,毛鸿宾出示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嫌,网罗四布”,再则谓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⑫3月9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复信称“钱公(钱宝青)信读过,去年公贬节一求,乃立竿见影

① 梅英杰《胡林翼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85页。

② 贾熟村称钱宝琛亦写作钱宝青,是曾国藩门生。曾氏遂利用师生关系,请钱氏从中折冲(贾熟村《对樊燮控告左宗棠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15页)。从两人科分及曾国藩致钱宝青书信称谓看,师生关系还不能坐实。另,钱宝琛和钱宝青实系两人。

③ 《复胡润之》(1859年10月9日、14日),《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346、347页。

④ 《骆秉章奏报申办革员畏罪狡供之情形折》(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宫中档奏折,406011072-2。

⑤ 《复彭玉麟》(1859年10月26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258页。

⑥ 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1860年5月6日,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08页。张曜孙对罗遵殿说,官文“绝无成见,左氏亦为洗刷尽净,无一毫干涉”。这或是有所掩饰,或是不明内情。《张曜孙致罗遵殿》(1860年1月26日),陶湘编《昭代名人尺牘小传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6—1297页。

⑦ 《官文、钱宝青奏报研鞫南省人证情形片》(1860年1月17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宫中档奏折,编号:406011640-0-A。1860年1月27日奉朱批“甚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2册,第216—217页。

⑨ 《官文、钱宝青奏报会审要案质讯明确按律定拟折》(1860年2月23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宫中档奏折,编号:406011802。

⑩ 《复胡林翼》(1860年2月27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426页。

⑪ 《胡林翼致毛鸿宾》(1860年3月7日),骆伟编《毛鸿宾湖广存札》,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⑫ 《与郭意诚》(1860年4月)、《与陈俊臣》(1860年),《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355、366页。

之事。今年虽贬，恐乏明效。”^①似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贬节相求”亦恐无济于事。因为这时胡林翼和官文“情意颇不相孚”。^②3月21日，曾国藩甚至说“鄂事神离，去年十月几已著矣。我公复缄亦殊辣。看来事将决裂。”直到3月24日看过官文回信，才说官文“亦轩爽坦白，鄂事或尚可支”。^③官文之所以没有决裂，一方面是因为湖北离不开胡林翼，另一方面也因江南军务骤然恶化。

胡林翼、曾国藩这时都劝左宗棠暂时隐退。同时，胡林翼也在京城联络中做了两手安排。一由钱宝青回京召见时为左宗棠辩解，此事发生在1860年4月1日。^④钱氏不仅“力为剖白”，且言左宗棠“才可大用”。^⑤一由郭嵩焘在京秘密运作。4月5日，郭嵩焘收到胡林翼劝其告病回南的密信。^⑥理由大抵是曾国藩、左宗棠“均忧危疑畏”，郭氏“独居承明之庐，亦不可久”，义应退归。^⑦实际是将僧王参郭嵩焘、官文参左宗棠以及曾国藩不被信任联系起来，为湘系受打压鸣不平。5月6日回南方前夕，郭嵩焘听钱宝青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以致骆秉章和胡林翼都有退意。当晚，郭嵩焘就与湘人王闾运和蔡毓春同诣尹耕云一谈。5月18日，郭嵩焘就听说潘祖荫近日连上两折，一保左宗棠，一请曾国藩救援四川。^⑧此折被咸丰留中数日后，于5月20日发下。次日寄谕曾国藩察看左宗棠情况，所谓“天下大转”。^⑨从此，左宗棠不仅脱离险境，而且深获重用。这里面有肃顺等人的疏通作用，但其大背景却是江南大营的溃败。

因此，樊燮案之上更大的时局背景，亦即江南大营的军情变化实甚重要。潘祖荫此次保举左宗棠，也正瞄准了东南军情不利、湘军将受重用的时机，实属顺水推舟之举。此前江南军务顺手、湘系不受信任之时，胡林翼和钱宝青暗中保护左宗棠的一系列运作，则更像雪中送炭之举。不幸的是，正当江南大营崩溃之际，钱宝青溘然长逝。随后，潘祖荫、尹耕云、高心夔、赵树吉、李鸿裔等人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 京城盟友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1860年夏，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迎来大举发展之机，湘系崛起之势终于不可遏制。但这一过程极为曲折艰难。张剑的新近研究表明，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曾国藩出任江督，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和朝臣解释疏通，所谓“开张宸虑，畅导群言”。^⑩概言之，这时面临的阻力主要有四：其一，彭蕴章等人一向压制曾国藩，咸丰更不放心曾氏；其二，一些高官认为非僧王带兵南下不可，任用曾国藩也无济于事。^⑪其三，许多朝臣主张大举团练，以应对江南危局，朝廷也予采纳。^⑫

① 《复胡林翼》(1860年3月9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434页。

② 《与李希庵》(1860年初)，《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324页。

③ 《复胡林翼》(1860年3月21日、24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447、451页。

④ 《钱宝青事迹》，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清国史馆传稿，编号：702002966-0-4。

⑤ 郭则沅《南屋述闻》，第153—154页；郭则沅《十朝诗乘》，《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581页。

⑥ 在胡林翼的劝告下，郭嵩焘决计引退，结果还受到彭蕴章的中伤。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1860年4月5日至7日，第293页。

⑦ 《胡林翼致郭嵩焘》(1860年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第11册，第12页。

⑧ 《郭嵩焘全集·日记》，1860年5月6日、18日，第308、311页。潘祖荫保左宗棠的奏稿也收在尹耕云集中，似系尹耕云所草。《荐湖南举人左宗棠疏》(1860年5月)，尹耕云《心白日斋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67—169页。

⑨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2册，第68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复胡林翼》，《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530页。

⑩ 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6页。

⑪ 《文煜致秋墅(姚仰云)》(1860年6月14日、7月19日、8月28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34册，第376、387、595页。《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3册，第145—146、150、239页。

⑫ 崔岷《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其四,主持皖南军务的张芾奏请自往苏浙,而令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看似推重,实则排挤。^①阻力既如此大,肃顺的权势也不宜夸大。8月间高层筹议和战,肃顺因主张被阻,“哽咽太息,辄唤奈何”。^②故肃顺虽倾向重用曾国藩,但要说服咸丰和王公大臣,却是艰巨任务。这既需要形势的有利发展,也需要盟友的巧妙配合,还离不开幕僚的暗中参谋。

早在1856年文庆当政之时,鉴于江南大营不稳且向荣老病,钱宝青就曾上奏举荐曾国藩或胜保接替向荣。^③1858年曾国藩重新出山后,胡林翼一有机会就替他向军机章京抱屈。^④1859年冬至1860年春,江南大营不断接近“成功”。这正是曾、胡不受信任的军事背景。然而,随着江南大营突然崩溃,重用湘军的声音又发了出来。

在此背景下,几项紧密关联的高层运作集中展开。一个此前未受注意的重要史实是,彭蕴章于1860年5月25日奉命出京督办陵工,6月10日方才回京。^⑤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如此关键时刻令彭蕴章出京系肃顺“排挤”,但趁亲王重臣出京之际发布重大决策甚至发动政变,也是晚清的常规操作。对于京城刀光剑影的运作,身在湖北的胡林翼颇有掌握。6月6日,他对彭玉麟说“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江南,“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亦即江督)乃可去”。^⑥果然,趁彭蕴章出京之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在四月中旬密集上奏。高心夔《中兴篇》有云:“翰林潘卿荐台赵,荐疏但入皆锁。侍臣故有造膝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会何知。”历来对该诗均解读为肃顺推毂曾国藩出任江督。^⑦张剑进一步证实肃顺不仅将高心夔代拟之奏折递上,而且造膝密陈,最终于6月8日促成曾国藩署理江督之命。^⑧

唯“翰林潘卿谏台赵”一句,尚未见合理解释。这恰是配合肃顺的直接行动。翰林潘卿就是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谏台赵就是御史赵树吉。6月2日和5日,潘、赵先后奏请罢斥和春、何桂清,重用曾国藩、胡林翼。潘祖荫称“金陵大营失陷以来……统帅节节退守,若再不予罢斥,更易大帅,在兵威已挫,士气愈衰……惟有仰恳天恩,简任附近邻省威望素著大员,如曾国藩、都兴阿、胡林翼等,统领得力将弁,星夜前往江苏。”^⑨赵树吉云“至附近各营,惟曾国藩、胡林翼两军向称得力,并请于二人中迅简一员,即以和春、何桂清之任任之……近日外廷建议者,每及将帅必曰曾、胡,臣非敢随声附和”唯“代此任者非统重兵,不足补创残之缺;非地居较近,不足践星火之期(暗指天津的僧王距江南太远,来不及救援)”。^⑩《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对两折的记载都是“带上带下,归籍”,说明咸丰和枢臣有过面议,但未下定决心。^⑪6月8日,何桂清、徐有壬、瑞昌、王有龄奏报苏州失陷的折子到京,终于令曾国藩署理江督。^⑫

① 《致彭玉麟》(1860年6月5日),《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533页。

② 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3页。

③ 《钱宝青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清国史馆传稿,编号:701000151。

④ 《致王少鹤》(1859年9月20日)、《复曹琢如王少和蒋叔起》(1860年3月13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329、459页。

⑤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4册,1860年5月25日、6月10日,第1515、1518页。

⑥ 《致彭玉麟》(1860年6月6日),《胡林翼集》第2册,第517页。

⑦ 杨鍾羲著,雷恩海、姜朝晖校点《雪桥诗话全编》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0—1341页;郭则沅《十朝诗乘》,《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655页;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第830—832页。

⑧ 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⑨ 《沥陈东南军务疏》(1860年6月2日)潘祖荫《潘文勤公(伯寅)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5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3页。

⑩ 《劾江督苏抚罪并请简员督办疏》(1860年6月5日)赵树吉著,祁青贵校注《赵树吉集校注》,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423页。

⑪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3册,第54、64—65页。

⑫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3册,第73—78页。

进言之,赵树吉的折子亦收入尹耕云文集,似由尹氏所草。^①从《高心夔日记》可知,1860年夏,高心夔、尹耕云、赵树吉、李鸿裔、范泰亨、莫友芝几乎日日聚集。^②他们都与胡林翼、曾国藩渊源颇深。1860年6月21日胡林翼保举16人,尹耕云和范泰亨赫然在列。^③潘世恩是胡林翼座师,也叙陶澍的渊源,故潘祖荫称胡林翼为世伯。^④赵树吉称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奉命督师江南后,他“喜极欲沾巾”。高心夔则“喜颂竟夕”。^⑤李鸿裔、莫友芝随后均入曾国藩幕府。尽管现存《高心夔日记》从1860年6月23日开始,故诸人在四月配合肃顺的筹谋运作尚看不到,但裁撤南河总督、添设淮扬镇总兵,请曾国藩、袁甲三保举人员一事可以参照。7月26日,尹耕云先建此议,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谋所以建白之道”。随后,尹耕云草折,赵树吉、高心夔、李鸿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读定义,李鸿裔手录一通。29日,高心夔以所录奏疏送给肃顺。^⑥8月4日上谕随之而下,与尹耕云建议若合符节。^⑦

需要说明的是,1860年7月27日彭蕴章退出枢垣后,肃顺已自言将入军机。^⑧后虽未果,但在此前,因英法“海上事秘”,军机处“多洩机要”,导致皇帝信任降低,高层权力已向御前王公倾斜。^⑨因此,胡林翼京城盟友密切配合御前大臣肃顺,仍可在疆吏与军机互动的脉络下讨论。最后,随着1860年9月庚申之变和次年辛酉政变接连发生,清廷实力和威望明显下降,湘军则不断崛起。此消彼长之后,清廷对胡林翼和曾国藩几乎有请必应,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价值也就有所降低。

余论

本文围绕胡林翼与咸丰朝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的密札往来,初步勾勒了1856年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联络的轮廓,论述了它是怎样展开的,并解释了它的多重意义。下面就其中反映的疆吏与军机互动问题,稍作申论。

就清朝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而言,疆吏与军机私下沟通是不允许的,但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却又是普遍现象。具体而论,军机处本来就有很强的保密功能,故历朝皇帝三令五申,严禁军机处人员交结外官,绝不能泄密。^⑩泄密事件一旦东窗事发,都会受到严厉处分。^⑪但“顶风作案”仍相当普遍。事实上,咸丰也知道军机处往外泄密,军机处也知道咸丰知道他们往外泄密^⑫,但还是如此行事,只不过尽量不暴露出来。其因何在?

① 尹耕云《心白日斋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11),第151—156页。

② 张剑整理《高心夔日记》,1860年6月23日至8月17日,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

③ 《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1860年6月21日),《胡林翼集》第1册,第650页。

④ 《呈岳父陶澍》(道光十九年),《胡林翼集》第2册,1027页;《潘祖荫来函》(1861年3月25日),《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424页。

⑤ 《曾涤生师奉命督师江南三首》,《赵树吉集校注》,第88页;张剑整理《高心夔日记》,1860年8月11日,第15页。

⑥ 张剑整理《高心夔日记》,1860年7月26日至29日、1861年6月9日,第12—13、57页。

⑦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3册,第227页。

⑧ 张剑整理《高心夔日记》,1860年7月30日,第13页。

⑨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下,1860年8月7日,第1047页。

⑩ 咸丰即位之初,就申谕军机章京“嗣后各宜倍加谨饬,于一切交游书札均须慎密,毋得仍蹈积习,致干重罪。”《清代起居注册·咸丰朝》第3册,1851年10月1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619—1620页。

⑪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⑫ 1860年恭王等奏设总理衙门,称“初议亦欲于礼部设立公所,以为接收往来文移之地。但各有专司,诸多未便,且事易漏泄。”咸丰朱批“即全隶枢垣(军机处),亦难免不无漏泄。”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第356页。

首先源于互有强烈需求。由于军机处围绕着皇帝,既处于发号施令之地位,也基本垄断着机密信息^①,故疆吏和外官不仅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而且渴求尽快获知这些信息。正如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瞿兑之所言“军机与外间通信,为职务上所不许。乾隆中曾屡谕申禁,然仍不能尽绝。盖外廷恃此以知朝中意旨,不惜百计以钩致之。”^②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由于高层机密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军机处的保密、泄密或解密,实质是权力核心圈的信息垄断、传播和发布问题,直接影响着政局和全社会。

除军机大臣外,有力量的军机章京也掌握这些信息^③,且比军机大臣更有余闲。同时,京官本就相对贫穷,而军机章京体统既尊,“车马衣裘之饰所费不贲,待漏倬直之勤亦倍于他官”,故不能不借“陋规”以“自润”。^④“陋规”则主要来自手握大量资源的外官。^⑤所以,疆吏不仅每年都要打点军机处人员,其专门传递信息、沟通情报的报酬另算,都有行情。^⑥此外,这种联络也会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互相扶持,形成官场做事必不可少的人脉资源。晚清的军机大臣若无几个关键疆吏支持,则办事极难;当然,疆吏若无军机处维护,也动辄掣肘,甚至地位难保。但是,若将这种联络互动一味说成是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亦不尽然。尽管利益关系是很显然的,但其中也不能简单用利益来衡量。胡林翼对京官的联络,总体上看主要出于公心。^⑦

从本文论述看,这种为法律所禁止却又普遍发生的“信息沟通”和“下情上达”的政治活动,确实影响着咸丰朝局与政情,也确实提高了曾、胡地位,助成湘军之崛起,进而成为改变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同治以降,小皇帝即位,太后垂帘,亲王领班,形成“同治”局面,最高权力不无下移,军机处的职权明显增大。^⑧甚至一段时期“时局尽在军机”,“权过人主”。^⑨而汉人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和翁同龢相继秉政,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湘淮军功出身之疆吏尤其权重。在此背景下,疆吏与军机的互动更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轮船、电报的推广,也使他们的联络沟通更为便捷。^⑩此期公文档案和私密函电多样丰富,如果利用得当,或许既能看到明线的京内外信息沟通和政治决策,也能看到暗线的信息沟通和政治运作,为军机处、晚清督抚及央地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帮助我们理解晚清的历史。

(责任编辑:胡永恒)

① 当时,李慈铭感慨道“此来军警日至,枢府(军机处)深秘不洩,朝官无知其事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1860年8月16日,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版,第1407页。

② 瞿兑之《辛酉热河史料钩沉》,虞云国、罗璋校订《铢庵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③ 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226页。

④ 瞿兑之《辛酉热河史料钩沉》,虞云国、罗璋校订《铢庵文存》,第71页。

⑤ 郭则沅《南屋述闻》,第132页;叶恭绰《说清代军机处》,王卫星整理《叶恭绰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7页。

⑥ 《何桂清等书札》,第23、27、54页。

⑦ 王尔敏称胡林翼联络京官是为支持湘系成功,重在大局而非为一己之私。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

⑧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47页。关于“同治”局面和话语,参见高波《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的形成与变异》,《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垂帘听政以来,军机处职权明显增大,参见刘文华《“旧制”与“规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⑨ 这是曾国藩在京亲眼观察所感。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4册,1869年7月7日,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701页。

⑩ 这从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端方等人的大量往来函电中,可以清楚看到。关于张之洞与京城的情报联络,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1—3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4 , 2023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Culture in the New Era *Zhang Haipeng*(4)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Cultural Realm: A Glorious History and Valuable Lessons Learned *Xia Chuntao*(10)

The Remarkable Creativ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PC's Drive for Self-Revolution *Jin Mingqing*(20)

The Evolution of the Drainage System in Modern Tianjin and Its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Cao Mu*(27)

After its opening as a port city , Tianjin rapidly emerged as a vital transportation hub and economic powerhouse in northern China. The original drainage system in Tianjin City , which utilized the city'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anal networks for wastewater disposal , underwent continuous expansion due to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urban growth. Consequently , a unique drainage system comprising manual transportation , canal networks , fixed drainage locations and sludge recovery facilities developed in Tianj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anjin's drainage system facilitated the return of organic waste in urban sewage to the farmland through a system that provided free sludge transport to the rural areas.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ewer pipeline and sanitation facilities in the concessions effectively addressed the hygien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manual and road transportation. However , these changes also resulted in a reduction in sludge volume and urban-rural fertilizer trade , thereby weakening the ec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rural areas. In essence , these developments had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city's ecological renewal and altered the ecological system that interconnected the urba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Regional Governors' Interaction with the Grand Council: Exploring Hu Linyi's Social Networks in the Capital and Their Significance *Han Ce*(45)

Although priv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gional governors and the Grand Council was strictly prohibited during the mid to late Qing Dynasty , these covert practic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itical maneuvering. A notable example is the revelation of a secret letter from the Resident of the Sword Shadow Room to Hu Linyi , which was first disclosed by Huang Jun in 1937. Huang claimed that the sender was Du Han , one of the grand councilors at the time; however , it was actually Qian Baoqing , a high-ranking bureaucrat working at the Grand Council. Qian Baoqing , a relatively overlooked figure ,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u Linyi's social network in the capital. Through these intermediaries like Qian , Hu not only gained access t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from higher authorities , but also utilized the channels to make his personal appeals to the higher level. Qian Baoqing not only provided intelligence to Hu , but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cision to authorize the Xiang Army's attack on Anqing from four directions. Additionally , he clandestinely protected Zuo Zongtang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n Xie Case. Collaborating with his allies , like Sushun , Qian played a pivotal part in the appointment of Zeng Guofan as the Viceroy of Liangjiang. These effort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Zeng Guofan , Hu Linyi and the influential Hunan Faction.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Tongzhi and Guangxu , advancements in ship transport and telegraphic technology mad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gional governors and the Grand Council more convenient. However , this development also resulted in the Grand Council , initially designed to be a hub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urce of leaked secrets.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Grand Council ,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capital city and various Chinese reg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of Procured Cereal in Jiangxi , Hubei , and Hunan Provinces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Tongzhi and Guangxu *Zhou Jian*(61)